

敦煌遗书 P·3774 号的研究 ——从一个家庭的财产分割牒看吐蕃统治下的敦煌

李玉林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文章通过对 P·3774 号敦煌文书的考证与研究,对吐蕃统治敦煌的时间段、牒状格式、牒状人物身份、文书结构、吐蕃生产生活、敦煌居民生活状况、敦煌家庭结构、汉人分家方式等八方面分析了这一时间段藏汉民族的生产生活以及相互联系的原貌。

关键词: P·3774 号遗书;时代特征;八个方面

中图分类号: K28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7)04-068-07

我国唐代史籍对唐前期和中原地区的历史记载较详,但对唐后期和边疆地区的记载则较略,尤其对吐蕃统治河西、敦煌的历史情况更是寥寥数语、零散杂芜。在有关敦煌陷蕃时期的敦煌文书中, P·3774《丑年十二月沙州长僧龙藏牒》,是一件颇为特殊的文书,它记述内容广泛、涉及父子两代、时间涵盖吐蕃统治敦煌的大部分时期,在诸多零散杂乱的文书中,这样内容具体广泛、叙事清楚连贯的颇为少见,很有研究旨趣。本件文书从形式上看虽然是请求财产分割的公文文书,但我认为它最大的研究价值却并不在于敦煌当时的财产分割,而在于它们全面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各个方面的时代特征。现从以下九个方面对此件文书做一个较全面的研究。

一、文书的断代及与敦煌陷蕃的时间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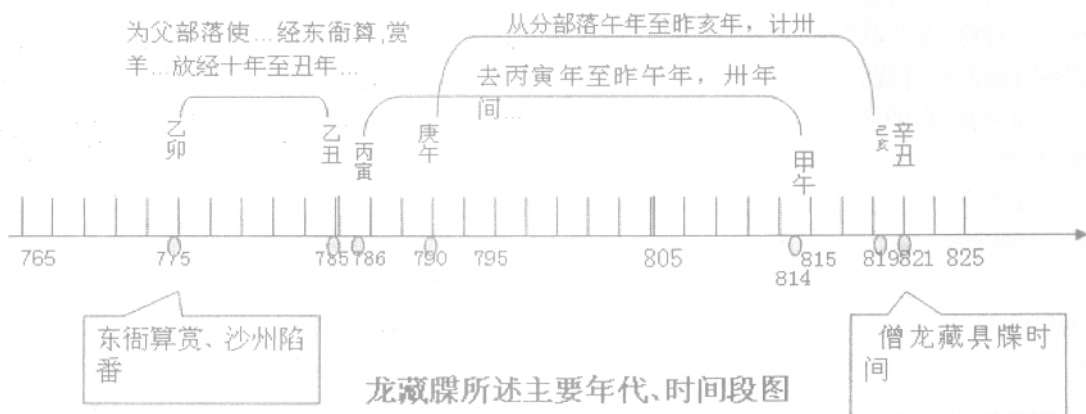
此件 P·3774 文书文末题有纪年,断代较为容易。据尾题“丑年十二月日”,可知其为吐蕃所独有的十二地支纪年法,时限大致应在唐末敦煌(沙州)陷没于吐蕃的时期(781?-848)。在此 60 多年间按吐蕃特有的十二地支纪年法,共有 5 个丑年,到底应为哪个丑年呢?文中第 8 行提到一个关键的断代信息“去丙寅年至昨午年卅年间”,丙寅年在吐蕃统治时期只有两个:公元 786 年和 846 年。公元 846 年的丙寅年是吐蕃统治末期即张义潮起义的前两年,这与文中“齐周身充将头”、“计功年别卅驮”

“从分部落午年至昨亥年,计卅年,计突课九百驮”等事实相悖。因为这提到的“将头”,是吐蕃政权基层官员所独有的称呼,“驮”也是其特有的计量单位,“计突”是其独有的对征税的称呼,故此丙寅年还可能是 846 年。因此“去丙寅年”只能是 786 年,即为吐蕃刚占领唐朝沙州的那一年,这也可从首段“大番兵马下,身被捉将”的情节相吻合。据此前述的“昨午年”也就应为 814 年的甲午年,称“昨午年的丑年”就应为 821 年的辛丑年。由此可断定此文书的具牒日期“丑年十二月”应为公元 821 年 12 月,这与唐耕耦、池田温等的断代相同。^[1]可知文书中所叙及的事情都应是发生在此时间(821 年)之前。

据文书中“经东衙算赏...至丑年...”等情节,此丑年是东衙应指东军将相,即河州大节度使^[2]算赏后的十年,现据《新唐书》等文献记载瓜州陷蕃在 776 年或八世纪 70 年代,那么丑年就应是公元 785 年的乙丑年。以此倒推,则东衙算赏的时间应是 775 年或 776 年(按年头算,该文书似乎提到的时间段多按年头计算),而吐蕃只有在有效控制了或曾占领了沙州之后,从“东衙”对其任命的当地部落使进行的“算赏”才能有效,这也就是说,在 775 或 776 年吐蕃就已对瓜州和沙州进行有效的控制,推行了部落使制度,任命地方官员,奖赏有功人员。这一推论比沙州陷蕃时间学说中最早的“大历十年说(777 年)”还早了一至两年。这从原始文献上为沙州陷蕃时间问题提供了新的观点,对学术界搞清这个问题

收稿日期:2007-11-10

作者简介:李玉林(1970-),男,汉族,甘肃白银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敦煌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文献及隋唐史。



提供了帮助。但从其他文书如 S·1438 书记来看,这时可能是敦煌“归化”即臣服吐蕃;而不是“陷番”即被吐蕃占领并派驻官员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有关时间推论见上面的示意图。

二、文书的定名

此文书在《敦煌经济文书真迹实录》中的原定名为“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遗产侵害纠纷”，我认为此定名虽然时间、地点、人物和事项等定名要素齐全，基本没有错误，但其表达尚欠祥密，易于引起歧义。初看，易于理解为沙州僧龙藏为自己的遗产侵害纠纷上牒，而文书中并没有提到此点，我们也无法确认龙藏就一定当事人齐周。从牒文的内容上看，我认为实际上是僧人龙藏为沙州百姓齐周的遗产纠纷上牒打官司。故这样定名可能更为妥贴：“丑年（公元821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为齐周遗产侵害事牒”。这样就补上了文书中的当事人齐周的姓名，就使表达的内容更为详实准确、符合原文，也避免了歧义和误解。

三、牒状的格式和内容补缺

本文是关于遗产的敦煌文书中，页数较多（计5页），字数较多（约1500字），内容翔实，涉及民事纠纷的公文文书（牒），实为少见，为研究1200多年前的敦煌和唐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法律、思想观念等状况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史料价值很高。但遗憾的是，此件文书前面缺失，使我们无法目睹到1200多年前这件文书的原始面貌和全文，只知牒尾的格式，不知该牒的前面格式、写法和内容，前缺部分也影响了对整件文书人物关系、事情缘由始末、遗产纠纷是非曲直的判断和理解，实为阅读该文书的一大憾事。尚未文明开化的吐蕃占领文化相

对发达的沙州后,当时的公文到底有什么样?前缺的内容又会是什么呢?能否较准确地对本文书格式和前缺的内容予以补充、复原呢?甚至预猜一下随后的判词呢?

笔者在阅读了一些相关文书,查阅了一些资料后,觉得还是可以还原牒文的格式和内容的。通过查找相近年代的有关遗产、债务、税差纠纷等牒状,研读这时期牒状的格式和内容、表达方式,P·3774文书的前缺部分的格式和内容也就隐约可见。让我们以年代仅差17年的另一件同类文书——P·3613号文书的格式,来归纳一下此类文书和判词的格式。P·3613虽只有短短几十字,但文书格式非常齐全,既有牒,又附有判词;既有完整的前后格式,又不残缺任何内容;既有牒、判词的尾题,又有前题,更为珍贵的是牒和判词上还可见到当时官使用粗体大字在上面所做的官方批文的明显印迹。把P·3774和P·3613号文书联系、对比起来看,可谓珠联璧合,一个内容详实,一个格式齐全,二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牒状格式的秘密就彰然可显。我们先来看一下此类牒的前面格式。P·3613文书的前端第1行为“孟授索底渠地六亩”,这是牒的标题或事由。第2行写有“右……”,这是开始叙述事由的正文部分,正文末尾最后提出请求“望请却还本地”,并恳求官方处理“请乞哀矜处分”。再之后是固定格式“牒件状如前谨牒”。最后是时间、具状人署名。可见,与大多数牒状相类似,当时请示裁决财产分割的“牒”的格式一般是如下图:



P·3774 文书的尾题结构较简单为: 时间 + 具牒人姓名 + 身份, 那么其缺失的首行前题到底应该书写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从格式齐全的 P·3613 文书后的判词来看, 它的前题中的“孟授”指敦煌的孟授大渠, “索底”是指索底支渠, 其前题所陈述的事由是: (令狐子余) 孟授渠索底支渠的六亩地。因此此类牒文的前题结构就应是(何人) + 何地 + 何事,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诉讼状中的诉讼标的。据此格式, 再结合 P·3774 号文书正文所述的人物地点、事由, 可复原 P·3774 文书所缺的牒文前题大致应为: 齐周请还财物、畜生、车牛。

本件文书前缺, 并且首段也有缺失或辨识不清之处, 这对文书格式和全文内容的判读、理解, 都造成很大的障碍。前面已推测出了前缺部分的首行应为牒文的前题, 那么前缺部分还应包括哪些内容呢? 从牒文的全文来看, 具状人以段首加符号“~”为标记, 分段叙述了 21 件事, 第 1 行到第 7 行的部分据推测段首也应加了“~”符号, 内容应为对某人的经历及阴二娘所遗留财物的叙述, 因为此部分颇费笔墨地详细交代了其人娶妻的经历及阴二娘死后遗留下的衣物的种类、质地和数量, 并像后文多次提到的一样, 强调“并大哥收拾”, 意在强调齐周也有继承权。但疑问在于第 1 到第 7 行的“空身却归沙州来, 娶妻阴二娘的”人是谁? 由于前缺和此段文书的缺失, 颇难让人一下子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个人是伯伯、齐周还是大哥? 应该说此行为人是齐周, 此段意在说明齐周的经历, 及其对其妻阴二娘妊娠所遗留衣物享有继承权。理由一: 从 22 处首字上加符号“~”的各段落大意来看, 都诉说了齐周与每件事所涉的财产关系。理由二: 文书末第 68 至 69 行龙藏提出“齐周所有用为斛斗及财物、繁重、车牛、人口, 请还齐周”, 阴二娘的遗留衣物也是财物之一。理由三: 文书后段第 59 行虽提到“今见齐周出家”, 但第 43 行也提到“齐周嫁女二”, 可见他也是娶过妻, 生过儿女的, 可能是其妻死女嫁之后孤寂难耐才遁入佛门的。娶阴二娘者有无可能是“伯伯”(龙藏对其的称呼)呢? 也不可能, 因第 57 行说“齐周不幸, 父母早死, ……与大哥同居过活”, 而“娶妻阴二娘”者似在婚后不久曾被“大番捉将”, “经三个月, 却走来, 在家中潜藏六个月”, 其时“齐周咨上下, 始得散行”。可知, 齐周既能疏通占领沙州的吐蕃“上下”官吏, 使用权其人得以重获自由“散行”, 他一定是一个成年人, 而不会是个婚后不久的幼子, 否则就与前面据说时间相矛盾了。因此, 从文中反映的时间推测, 不可能是“伯伯”。从文中也找不出是“大哥”的证据。因此从事例证据、逻辑

推理、文书字词相印证等方面看, 最有可能的只能是齐周了。

因此这件文书的前缺部分的内容, 据推测可能是介绍齐周本人的身份、经历的内容, 当然还包括牒文首行的前题句。同时从前缺刚好是页缝中的部分来推测, 前缺部分应为一页或二页。从前缺的内容来看, 最可能是介绍齐周的身份和应占有的奴婢等其他人口, 因为唯有这部分内容在文末提出了继承要求而在内前文中只字不见提及, 也可能涉及到一些财物, 但不会太多, 因为从文末所提的诉讼要求看, 已提到了 22 件事项, 涉及斛斗(粮食)、财物、畜生、车牛四大类, 都分别有所论及, 应该再没有什么遗漏的了。

四、牒文中的人物身份及相互关系

本文书中的龙藏, 是此件文书的具牒人和上牒人。其身份据文书尾题“沙州僧龙藏”, 可知他当时是敦煌的一名僧人, 法号可能叫龙藏。文中提到的事发地、当事人都在沙州, 可知他是唐末吐蕃占领下的沙州某寺的僧人。龙藏的名字在某些敦煌文书中也有出现, 包括姜伯勤先生在内的许多人都在文章中认为此龙藏就是敦煌研究院编 144 窟窟主龙兴寺上座龙藏。但我认为证据尚且不足, 不能仅凭两人名字相同, 身份同为僧人, 就断定他们就是同一人, 须知“龙藏”二字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 是僧人、佛教事物中常用的名称, 重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对比了 144 窟的题记和本件文书的内容之后, 我发现两人在以下几方面不能契合: 一、两人的亲属关系不一致。僧龙藏其父为部落使, 但父母早亡、娶妻可能“阴二娘”, 至少有两个女儿, 还有一个伯伯、一位堂兄“大哥”、一位堂弟“宣子”, 而龙兴寺上座龙藏则在题记中提到其叔为索留南, 曾为部落使, 并未提到“大哥”和“宣子”及其他前述人物。^[3]二、时间不相符。僧龙藏具牒日期为丑年十二月即公元 821 年, 推算其当时的年龄当在 51 岁左右, 其应当生活在吐蕃统治时期, 如果它能活到 78 岁, 才能生活在归义军统治时期; 而上座龙藏修的 144 窟从供养人到壁画风格基本都是晚唐归义军时期的。我认为具牒人龙藏也不是牒中的当事人齐周, 僧龙藏在牒中没有一处用到第一人称的语气和人称代词, 一直是用第二人称语气和人称代词如“齐周”, 完全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陈述。当然他在文中也用了“伯伯”、“大哥”等词, 但这也可以解释为龙藏与这家人有血缘关系, 可能是齐周的堂兄弟且辈份比齐周高, 比大哥低, 故具牒人有如此称谓。我们

在其他敦煌文书中也能多次见到出家的亲属和亲戚被请来调节民事纠纷、诉讼,充当见人、保人,^[4]因为吐蕃统治时期崇尚佛教,僧人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且佛教教团僧官机构还享有管理民事的权力。

齐周,本牒的当事人和原告,阴二娘之夫,“大哥”之堂弟。见文末“父母早亡,比日以来,齐周与大哥同居过活”。他育有二女,曾“身充将头”,担任吐蕃政权的基层官吏。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在沙州设有十三个“部落使”,部落使用权下设“将”,将有“将头”。他诉讼前刚出家为僧,精明能干,多置产业,对家族的贡献很大,在以前的家财分配上多次吃亏。

“大哥”,齐周之兄。贪图家财,心胸狭隘,主动提出分家“别居”,不遵“(伯伯)先经分割财物”的约定,贪占其弟齐周应得的财物。其可能有女三人,其中一人叫平娘。

“伯伯”,齐周的伯父,“大哥”之父。他颇有家产,“私种田卅亩,年别收斛斗卅驮…合计一千驮”。按其留下粮食的最后时间,“至昨午年卅年间”,他去世的时间可能为 814 年的甲午年。

阴二娘,齐周之妻,与齐周育有二女,但婚后不长时间就死了,死后留下了一些随身衣物和财物。其娘家可能是敦煌有名的大姓阴氏。

宣子,应为齐周的堂弟和“大哥”的亲弟弟。因为,在第 35-37 行间,记叙了其家庭成员财产分配和收支是这样的情况:“宣子娶妻”和“趁入所由印”的花费收支与“大哥”嫁女、齐周嫁女、“大兄度女”是平等排列的,且按长幼顺序先后叙述,此外宣子的花费比二人嫁女要大得多,这都说明宣子与“大兄”、齐周在家族关系上是处于同层次地位的,即为“同籍共财”的大家庭中的叔伯兄弟。另外,在第 17 行,叙述家中被贼劫掠时,也并列提到“其时大哥身着箭,宣子病卧…齐周请…”,可见其是与“大哥”、齐周一样,是家庭中支撑门户的成年男子。宣子不太可能是二人中某一个的儿子,因为在二人嫁女时,行文表达为“大兄嫁女”、“齐周”嫁女,按此样行文,如果是大兄的儿子,其会表达为“大兄子宣子娶妻”。

五、文书的结构内容及纠纷的缘由

除前缺的部分外,本件文书分为 5 页,具牒人以段首文字上加符号“~”的方式,分段列举了 22 件与财产继承相关的事项。从全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来看,前面的第 1~56 行,都分别叙述了齐周家各项财产(床、衣物、谷物、牲畜、车牛、杂用物等的来

源和收支情况,以及各项财产与齐周的关系,最后第 57~73 行概述了此项财产纠纷的缘由,对齐周与大哥的纠纷做出了是非曲直的判断,并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及理由,请求官府处理裁决。

根据文中各段所述事项,尤其是最后一项“右齐周不幸,父母早亡,比日以来,齐周与大哥同居过活,并无私己之心。今见齐周出家,大哥便生别居之意。昨齐周与大哥以理商量,侵害什物及房屋畜生等,年有好者,先进大哥收检,齐周亦不谏论。昨大哥取处人之言,妄说异端,无种宣竟,状称欺屈,此及虚言,妄入人耳。”,我们可从中清楚地看出此项纠纷的缘由:在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中,“大哥”先有“别居”之意,经二人按当地的常规习俗商量达成一致后,分配了各自应得的什物房屋畜牲等,但大哥分到的东西较好。之后,大哥又听了别人的挑唆,反悔了前面的约定,反称自己吃了亏,因此齐周才提出财产重新分割的诉讼,请僧人龙藏上牒,求官府裁决。这是敦煌在陷蕃时期同籍共财型复合家庭分割财产的典型案列,对我们研究当时敦煌的家庭结构和唐末五代的分家分割遗产很有帮助。

六、文书提及的家庭财产所反映的陷蕃时敦煌的生产经营活动与物质生活

从文书前后叙述来看,吐蕃占领下的沙州百姓主要从事以下几类生产经营活动:

(一) 此时农耕地仍是陷蕃敦煌汉人从事的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从文中看到,陷蕃时沙州人耕种的田地可分为两种:其一为“私种田”,见第 8 行“伯伯私种田卅亩”,这个数量相当于唐朝均田令规定的一丁男分田 20 亩的 1.5 倍,也是贞观年间狭乡一丁男的分田额。^[5]其二为种官田,见第 23 行“于官种田处,种得糜”。“寅卯辰三年,每年得糜三车”,“已年两支各得麦三车,以上计糜麦十二车”,从齐周一个沙州大家庭可见汉人在陷蕃时的沙州主要从事的生产仍是农耕地,而非人们以前所臆测的吐蕃可能毁田而畜牧。还可发现沙州当时主要的农作物是麦和糜,且二者的亩产量是相当的。此外,后面还提到的粟,也是这时的重要农作物之一。杨际平先生研究认为吐蕃实行的是计口授田制,每人授田基本上是一突即十亩,身居高位者自不在此限,齐周复合家庭据推算田土应不少于二至三顷。^[6]可能“种官田”就是吐蕃按在敦煌普遍推行的每人一突的计口授田制,根据他家的实有人口数所分得的田地;而“种私田”即指自己原有的田地或自己开垦出的荒地。种植业一直是齐周家族自家从事的最基本

的生产方式,也是最基本的收入来源。

(二) 畜牧业是陷蕃敦煌汉人从事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文书中称“(齐周)先家中无羊,为父是部落使,经东衙算,赏羊卅口中,耕牛两头,雌牛一头...”,以这些算赏的牲畜为基础,“齐周自出牧子,放经十年,后群牧成,始雇吐谷浑牧放,至丑年羊满三百,小牛驴共卅头,以上耕牛十头”,仅从羊来看十年间牧养数量增加了十倍。虽然齐周家的身份特殊不具有代表性,但我们仍能从他家事例看出,沙州人在陷蕃前并无普遍养羊放牧的习惯,“先家中无羊”,但在吐蕃人统治后开始大量出现畜牧生产,这一定是高原放牧民族吐蕃人支持和鼓励汉人畜牧的结果;此时期畜牧的成效似乎很高,齐周家的牲畜繁殖得很快,可能是吐蕃人带来了他们较先进的畜牧技术;畜牧方式有:几十头的由家庭放养和百十头的群牧雇佣吐谷浑人牧放,出现了雇佣游牧民族放牧的奇特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汉人养牛不像吐蕃人那样是为了获取乳肉皮等产品,而主要是为了犁地拉车役使,齐周家前后置办了好几辆车,仅车上所用的常用部件——车轂,一次就买了三支,可见车牛是他们的常用器具。

(三) 酿酒开酒店、铸造铁器、从事运输、进行商品买卖也是陷蕃敦煌汉人所从事的家庭副业。文书中提到“齐周自开酒店,...并出本糜粟卅石造酒”,原料成本投入并不大,但所得利润极为丰厚,“其除契用外,得利刈价七十亩、柴十车、麦一百卅石”,仅所得麦一项就是原料的四倍。牒中称“(齐周)种田不得富饶”,于是自开酒店,可见陷蕃后的敦煌对酒的市场需求很旺盛,饮酒风气还是很盛行,酒的销路很好,酿酒业较为兴盛,酿酒开酒店成为当时敦煌人发财致富的一条捷径、一个暴利行业。文书也提及“齐周差使向柔远 古县名,唐置,在今新疆哈密市东南)送粮”,随后写道“却回得生铁熟铁二百斤已来,车钁七支”,很明显齐周在用自己家的牛和车进行类似长途贩运或被吐蕃政权雇佣向柔远运粮,而不可能是应吐蕃政权的车牛役,因为差役是无偿的,而齐周因运粮而获得了价值不菲的实物回报。从送粮的目的来看,齐周也是为获利求丰饶。然后他将“回得铁”“内 纳)卅斤铛釜熬泻得八斗釜一口”,可见他的目的是用贩运所得来制造酿酒的器具釜。从“手功麦十石,于裴俊自取会王菜”,也可看出吐蕃统治敦煌时当地仍存在着专门从事铸造铁釜、铛釜、车钁、车轂的手工业。当时各个行业的交易有以物易物,也有用便于分割计算的谷物如麦来充当一般等价物,不见用金属货币流通的现象。这时应当是在吐蕃统治的中后期,因为在 S.1438 背 - 书仪

中提到在玉关驿户起义被平息之后“百姓特沐赞普鸿恩,相府仁造,各各居产业坦腹无忧,凡厥氓不胜作跃,更蒙支铁,远送敦煌,不并(耕)农具既多并(耕)自广...”,铁器已被开禁,百姓可随意不限量地买卖,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已经稳固,敦煌的各项生产恢复了陷蕃前的状态。

从文书中提到的商品交换的诸多种类来看,数量最大、最频繁使用的交换物是粮食(主要是麦),它几乎可以交换任何商品,并可作为嫁娶的财礼“妇财”。可以认为吐蕃在占领并统治敦煌后,废除了唐朝普遍使用的货币,实行游牧民族以物易物的商贸传统习俗。这固然与吐蕃落后的习俗有关,也当然与敦煌这一地区不产金属而盛产粮食有更大关系。在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除粮食外,布等纺织物、驴羊等牲畜、生铁熟铁及釜钁等铁制品也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不同商品交易的媒介。文书在六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提到的各种商品交易活动中,没有一项使用或涉及货币,既不见唐代的铜钱,也不见西域流通的金银币,说明吐蕃统治敦煌、河西和西域时,与西域的经济贸易不够繁盛,与唐代商贸相比有很大程度的衰退。

综上所述,沙州陷蕃时期,敦煌地区汉族居民在唐朝所从事的各项传统产业仍然都还存在,没有多大变化,但汉人的畜牧业有所发展,畜牧水平有所提高,商业贸易虽然也较广泛,但交易方式倒退回了以物易物的落后、低级形式。

七、陷蕃时期敦煌居民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

仅从此篇文书的个案来看,这一时期的敦煌人的物质生活还是较为丰富的。以阴二娘和齐周后母所遗留的衣物看,这个基层官吏(前部落使和现任将头)之家,衣物种类还比较丰富,妇女们有罗裙、袴、罗衫子、被子、袄子等;质地也较优良,有布、锦、绫、缣等;色彩也斑斓艳丽,有红锦、皂绫、碧罗、缣等;还有花毯。

文书中所见的农作物主要有麦、粟、糜。当时敦煌人的食物也应当是以此类食物为主要原料做的吧。值得注意的是齐周酿酒所用的原料,只是自产的糜子和粟,并未提到用麦酿酒,这是加工技术的限制呢还是其他原因呢?大概是因为麦还比较短缺,售价较为昂贵吧,而糜子和粟是粗粮产量大,售价低。另外,羊奶、牛奶可能也是此时敦煌汉人的重要副食品,因为当地嫁娶都有用羊作财礼的习俗“宣子娶妻,妇财羊七口”,这说明羊已是人们较普遍的家畜,可能每家都养羊,只是各家多少不一而

已。文书中还提到了“油二斗五升”，并把它也作为娶亲聘礼。

当时敦煌妇女普遍使用的个人器物有剪刀、针线、镜子等物，齐周家有鈿贝镜（似是用金宝蚘壳镶嵌的镜子），齐周用它行赂于梁舍人，以求“依附在尼僧门下”，最后如愿以偿，可见此镜比较贵重。当时男人常用的器具有“犁铧锹鏊”、“车乘钏铜”、“铛鏊釜床”，也是日常用品。

这时敦煌居民可能居住的房屋还不宽敞。齐周的父亲虽是前部落使，但“家中房室总有两口”，一般的百姓的住房可能更狭小。但人们此时更热衷于修建寺庙，文书中提到“城南佛堂并油梁及大乘寺明觉房...”，可能就是齐周家族建造的兰若或给寺庙的捐献。可见这时的人们精神的追求远远大于生活物质的享受，这既是陷蕃后汉人们精神需要有所寄托，也是吐蕃统治者占领沙州后，大力提倡和扶持佛教以安抚人心的一个结果。

当时人们可能广泛使用牛车驴车作为出行工具和运输工具。农作物的收获量这时也可以用车作为度量单位的，如“得麦三车”、“柴十车”，齐周差人送粮送果物等官私货物也是用牛车驴车，不见提到用骆驼、马，可能这两种牲畜已经是吐蕃人严格控制战略物资，不许用于民间。因为在沙湫遍布的瓜沙地区，车的重要性就极为突出，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差科簿中屡次提到车和牛，并且车牛总是连着称呼的。一般人家常常会备有牛驴车的，文载齐周“用驴、布买得车一乘，车轂三支并钏”、“回得...车钏七支”，从他交换和买来诸多的车钏车轂等配件，我们可以想见他家车上的配件磨损得有多快，牛车的使用得有多频繁。

从生活的各方面看，吐蕃占领时期（主要指中后期）敦煌汉人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向吐蕃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转化；除男子“披发左衽”外，其他物质生活、婚嫁等社会习俗也未见有多少大的变化，基本保持了汉人原有风俗习惯的稳定性，与中原内地汉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依然保持了汉族固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

八、敦煌陷蕃时的家庭结构、社会生活

文书中前后提及的有名或有姓的人物共有十五个，属于官府中的有阎开府、安都督、梁舍人、金牟使、部落使乞心儿、张剑奴、沙州僧龙藏；属于邻居的有赵再兴、张英玉、安恒处、博得大、人上、裴俊、铁匠王菜。文中没有提及姓名，只陈述人物身份和关系的是且属于齐周大家族的有 14 人：分别是

伯伯、大哥、齐周父母及后母、阴二娘、宣子及新娶妻、大哥的三个女儿、齐周的两个女儿。按文书所述齐周父亲死之前，齐周当与父母及其妻阴二娘组成一个主干家庭；在其父死后齐周一家开始与大哥一家“同居过活”，与伯伯、大哥及其妻女、宣子组成一个扩大的联合家庭（兄弟两个家庭共同生活在一起），直至齐周出家大哥出于多占财产的目的提出分家。张国刚先生提出唐朝的家庭结构具有二元性的复合型特征，主要有“同居共活”、“同籍别居”两种模式。齐周家族就是“同居共活”型家庭的典型代表。他们娶族而居，组成一个庞大的家庭，与唐内地的此类家庭不同的是他们同居并不异财，而是一直同财，整个家庭成员共同劳动、所获财物共同分配，甚至连古代一直实行的不能分割的妻财，也被“大哥”纳入大家庭公同拥有。这种家庭结构应该说在陷蕃后的敦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敦煌文书中吐蕃时期的差科簿中所记录的户口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一方面诚如张国刚先生所说是受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父母在，不分家异财”思想的影响、或受唐朝容允和鼓励民间建立互相救助的复合家庭模式的政策影响，但我认为更主要的是这时正处于吐蕃侵占陇右和河西的战乱之后，长期的局势动荡和许多家庭的妻离子散，迫使敦煌汉人聚族而居，结援互保，既可抵御外敌的威胁，也可生活上一起照料共度难关。但这种复合型特征的家庭由于家庭成员多达十几人以上、成员间的关系复杂、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故容易在财产和生活上产生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常常导致激烈的财产纠纷，甚至分家别居，造成主干联合家庭解体。齐周一家家庭结构变化就是这个时期河西和陇右整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反映。随着吐蕃在河西和敦煌统治的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家庭成员的不断增加，联合家庭的解体就势在必然，逐渐瓦解，最后被分解成更多的核心家庭或典型核心家庭。

文书中也反映了吐蕃占领时期的一些很有特色的社会生活现象。首先是有“妇财”的婚俗。敦煌人嫁女，娘家可得到男方赠送的彩礼，男方娶妻需支付聘礼，称为“妇财”。大概中等人家普遍的彩礼标准是麦廿石，有的还用羊、花毯、布、油等作妇财。值得注意的是，在吐蕃时期，佛教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势力已经渗入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如“大兄度女平娘”为“买度印”不惜花费“驴一头，雌牛一头”的可观经济代价，齐周年过五旬时也要出家，可见出家入佛门对当时小户、大姓、将头、部落官员等各阶层的人都有普遍而强烈的吸引力，而吐蕃统治者或是为了敛财，或是为了控制僧尼的数

量,采用了类似后世出售度牒的方式。这说明在吐蕃政权的极力推崇下,佛教及僧人在当时敦煌的社会中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享有许多普通居民不能享有的特权。

九、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人分家分割财产的几种方式

这是一篇分析家产的牒文,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当然早就有前贤做出过深入研究。齐陈骏先生认为纵观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二十多件文书,唐宋两代家庭财产分割和继承的基本原则有:一、根据尊长和死者的遗嘱分配。二、遗产要均分。三、有一些私人财物如妻财等不列入均分的家产之内。^[7]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在兄弟别居分家之时,对财产的分割还普遍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一) 分家的兄弟按照习俗、常理相互协商解决。大哥在得知齐周要出家时,提出分家,“兄弟间以理商量”。这发生是在“伯伯数度分割”之后,既尊长的遗嘱继承之后,所以“兄弟间以理商量”可能是当时最主要、最经常、最有效的财产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古时期政府还没有严格而具体的法律规定,管理的范围有限,民事纠纷大多由乡民根据乡规民约、伦理风俗自行解决。

(二) 亲属和亲朋好友的参与和说和。如文中载“昨大哥取外人之言,妄说异端,无种渲竞,状称欺屈者...”,这是亲友们在财产侵害中起到了挑唆、离间的作用,破坏了兄弟间业已达成的协议的例证。相反,亲友们在涉及财产时帮助、援救、撮合、成人之美的时候更多。如当齐周家的三百多头牲畜“尽被贼人捉将”时,“齐周请知己百姓,遮得羊一百卅口,牛驴共十一头”,靠亲友们的帮助拦截下四成以上的被劫牲畜,挽回了相当的损失。又如在“未得牛中间,亲情知己已借得牛八具”,在乡亲的援助下“种润朵地至毕功,其年收得麦一十七车”,获得了丰收,度过了无役力可供驱使的困境。可见,在吐蕃统治的敦煌,吐蕃政权重点在于征收赋科、征发差科、无暇顾及百姓的生产和消弥盗贼,百姓们在发生生产困难、遭遇贼人侵害时,亲戚朋友、邻里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三) 当地僧众的协调和僧官机构的裁决。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为了利用力量加强统治,大力弘扬佛

教,极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广蓄僧众,敦煌寺院僧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不同于唐朝的、有明显等级的僧官体系。据日本学者竺沙雅章的复原,僧官体系如下:都教授—副教授—都法律—法律—都判官—判官^[8]。这时敦煌僧尼的社会地位较高,许多名门望族人士也入寺为僧尼。僧官体系与吐蕃的军政体系共同构成了控制中古时期敦煌的政教两极权力机构,僧官体系在对人们的精神世界、烦碎的民事、生活习俗等具有更深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像齐周家一样,敦煌民众在出现个人和亲友不能调节的财产纠纷时,他们就会求助于僧官体系,一般向附近寺院的、有亲戚故旧关系的僧官和僧人提出自己的要求,请求他们担任契约和其他文书的见证人、保人,僧人们广泛参与了财产纠纷的见证、调解和裁决,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以上通过对吐蕃统治时期的一件内容较丰富的有关财产侵害纠纷文书的抽线剥茧般的剖析,力图从一个家庭入手,以家庭财产为中心,尽力揭示唐代史籍所不载的陷蕃后神秘的敦煌的生产经营活动、汉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家庭结构和处理财产纠纷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个家庭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毕竟它是我们能找到的少见的家庭实例之一,还是能真实反映出当时相当多的历史风貌。对于一千四百多年前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来说,它就像笼罩在一个茫茫历史迷雾中的一个小镇,如果我们能剖析清楚其中一户人家的状况,那么这个细致的、鲜活的个体就是了解掌握整体的一把钥匙。因此,我们在研究敦煌文书时不应忽视解剖麻雀的方法,应把个案的研究同整体文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既见宏观,又见微观,最终揭开历史之谜。

参考文献

- [1][4]唐耕耦,陆宏基.真迹释录[M].敦煌社会经济文献.
- [2]金滢坤.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J].敦煌研究,2002(2).
- [3]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2.
- [5]池田温.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M]:55.
- [6]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M].//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1).
- [7][8]齐陈骏.有关遗产继承的几件文书敦煌遗书[J].敦煌学辑刊,1994(2).

[下转第 81 页]

从双语教学的模式看, 已经发展成为三种主要的类型:

参考文献

- 1、各科教学以藏语授课为主, 同时开设汉语文课的双语教学模式。该双语教学模式主要分布在县以下广大的农牧区小学 (包括教学点)、县属中小学及各地市的部分初中。在这类模式中, 2001 年以前小学从高年级 (一般是三年级) 才开设汉语课, 自 2001 年开始, 城镇小学从一年级开设汉语课, 其他课均用藏语教学; 农牧区小学根据不同情况有条件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汉语课, 每周课时一般 6-8 节, 其他课用藏语文教学。
- 2、各科教学以汉语文授课为主, 少数民族学生加开藏语文课。
- 3、以汉语授课为主, 同时使用藏语辅助的双语教学模式。地 (市) 以上城市学校以及大部分县初中都采用后两种模式进行教学。

[1]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 西藏自治区概况[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 417.
[2]多杰才旦. 西藏教育[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71- 76.
[3]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 西藏自治区概况[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 418.
[4]多杰才旦. 西藏教育[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89.
[5] 1960 年和 1961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 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 每期学制三年, 邀请知名的藏学家开设藏语文和藏学课程, 培养藏学意见人才。
[6]阿沛·阿旺晋美, 班禅·确吉坚赞. 藏语文工作[J]. 1990 (2): 41.
[7]阿沛·阿旺晋美, 班禅·确吉坚赞. 藏语文工作[J]. 1990 (2): 41- 42.

On the Tibetan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Language Education

Zhou Wei

(Social Economy Institute of Tibetan Studies Center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ibeta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ibet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ws the feature of Tibetan language policies. The paper assumes that, from 1951 to now, Tibetan language education that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ibetan language policy has experienced the debut,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period. The basic policy is the same for the difference of the main task and measures taken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 words: Tibetan; policy; educatio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蔡秀清]

[上接第 74 页]

Study on the Dunhuang Document P.3774
- - - To Observe Dunhuang under the Rule of Tubo Kingdom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a Family Property Document

Li Yulin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and study on Dunhuang document P.3774, the paper displays the original outlook of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 's lif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reign of Tubo Kingdom over Dunhuang by analyzing the time period of ruling Dunhuang by Tubo, the form of document , the identities of people, the structure of the document, the life of Tibetan, the life of Dunhuang people,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Dunhuang, the way of dividing property by Chinese.

Key words: document P.3774; the feature of the age; eight aspects

[责任编辑: 肖干田]